

■ 李帆 / 主编

民國思想文叢

【古史辨派】

吴岩 李晓涛

长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李帆 / 主编

民國思想文叢

【古

派】

李曉濤 編

長春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史辨派 / 吴岩, 李晓涛.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3.1
(民国思想文丛)

ISBN 978-7-5445-2653-1

I. ①古... II. ①吴... ②李... III. ①史学流派—研究—
中国—民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4525 号

古史辨派

编 者: 吴 岩 李晓涛

责任编辑: 张耀民 胡 新

封面设计: 大 熊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7997924

编辑说明

本书收录体现“古史辨派”基本思想主张的代表性作品。因古史辨派的形成、发展都与《古史辨》的汇编成册、出版发行密不可分，故而本集的作品从顾颉刚等人编撰的《古史辨》（全七册）中摘取。

在作品编选过程中，为尽量保持文章原貌，除对明显错字进行改动外，其余皆仍其旧。由于《古史辨》文章写就年代较早，某些语言习惯和外来词译法与今有异，外文存在不少讹误，出于忠实原文之考虑，未作改动，原文注释亦一并保留。文中标点均统一采用新式标点。如个别篇目有所删节，则以省略号标出。文中凡有损坏、缺漏或字迹不清者，则以□号表示；正字均以〔 〕标明。每篇文章之后皆注明出处、发表年月及收录文集；若因初刊时间无从查考，则暂从文集出版年月。

我们力求搜罗最能代表古史辨派思想的作品，但囿于篇幅，仅能选编部分，难免有遗珠之憾。此外，把握这样一个与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现代思想皆有渊源的流派，我们深感力有不逮，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编 者

总 序

思想如何分类，向来是个难题。从古至今，人类思想呈现多姿多彩的面貌，每一种思想皆各有主旨，各具风采，特色鲜明，或可名之曰“家”，或可名之曰“派”，晚近则有“流派”之名。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两个时期最引人注目，一个是先秦时期，一个是中华民国时期。先秦自不必说，诸子百家，各显其能，争鸣不已，异彩纷呈，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影响及于后世两千余年。民国思想虽未能再现“百家争鸣”的胜景，但亦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甚多，思想文化论战此起彼伏，思想交锋异常激烈和复杂，而且实现了对中国固有思想传统的实质性的挑战与超越，形成一些新的思想、学说体系，整个思想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之所以如此，既在于晚清以来西学的大举进入，西方思想、学说与中国固有观念、学问的碰撞、交融，已使得相对单一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遭到极大冲击，乃至近于分崩离析，从而为民国时期多元思想、文化格局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又在于形成于清末、壮大于民国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尤其是清末民初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在民国年间纷纷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力量。所受教育的差异以及与各类集团、群体、势力的不同关联，使得他们形成相异的思想、文化理念，在当时各种矛盾纠葛交织的时代环境下，往往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问题提出自身旗帜鲜明的主张，并引发激烈、复杂的论战与斗争；也在于民国北洋政府，尤其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尽管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但因各种原因，还是给予思想家和学者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允许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并存而且彼此展开争论；还在于民国时期社会空间的相

对扩大，如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建立与迅速发展，报刊、出版业的极大发达，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等等，为思想界精英结合成志趣相投的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些因素下，民国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

作为思想繁荣的表征之一，便是民国时期出现思想家群体和流派众多的景象。这些群体和流派主要分布在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领域，此外在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内部也不乏各种流派。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主张各异，或趋近于民族主义，或趋近于激进主义，或趋近于自由主义，或趋近于保守主义，不一而足；而且延续的时间也长短不一，有的起步于清末，进入民国后发扬光大，绵延数十载，有的仅在北洋政府时期或国民政府时期昙花一现，数年后无果而终。由于流派是个不易界定的概念，大家对之的认知不同，于是人们所认定的思想流派的存在方式也不全然一致，有的依托于同人报刊或出版物而存在，甚至一个刊物就会造就一个流派，如甲寅派、新文化派（或称新青年派）、现代评论派、学衡派、古史辨派、醒狮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战国策派、观察派等；有的依托于某一机构、团体或党派而存在，如所谓北大派、南高派，以及乡村建设派、国家主义派等；有的仅仅因为主张趋同而被视为一派，如无政府主义派、科学派、玄学派、西化派、文化保守派等。就流派的划分界定而言，这些“派”并非完全处在同一层次，其中既有角度、性质之别，又有大小之分，还有人员、主张等的多重交叉，甚至是派中有派，如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中又有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同的思想派别存在。由于思想流派众多，思想文化论争也因而接连不断，如民国初年的孔教之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白话与文言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故而民国时期成为继先秦之后，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论争最多的一个时期。

通过发布并实践自身的主张，这些流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让国人听到了思想家们独到的声音。而且这样的声音在争鸣中成长壮大，日臻成熟，自成一体。无论其主张如何相左，但整体而言，大抵皆对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和整个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从各自立场发挥了思想支撑和引

领作用，并为今天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从民国思想史的研究状况看，学术界对这些流派虽有所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派中人，如刘师复、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吴宓、梅光迪、柳诒徵、顾颉刚、张君勱、曾琦、李璜、梁漱溟、晏阳初、张奚若、罗隆基、梁实秋、雷海宗、林同济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整体而言，非常不乐观，不仅是某些流派未被全面系统的探讨过，而且有些派中人乏人问津，形成不少学术空白点。这一情形的出现，与多种主客观因素相关，如问题意识的局限、一流之外的思想家不被重视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原始文献资料的缺乏系统整理，导致研究者无从着手或着手不易，从而知难而退。近年来，出版界虽推出了不少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方面的文献资料集，不过总体而言，这些资料集重晚清轻民国，晚清思想资料的出版蔚为大观，系统性颇强；而民国思想资料的出版则相对不足，尽管已有一批思想家的个人全集、文集、选集等陆续出版，也有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汇编一类的书先后面世，但存在着要么过于分散、要么过于笼统的弊端，针对民国思想特点而编的特色性资料集不多，如以思想流派作为归类的文献资料集就尚属空白。所以，以“民国思想文丛”之名系统整理出版民国思想的文献，显然是极为必要的，既能克服已有出版物或分散、或笼统的弊端，又能体现民国时期思想流派众多这一思想史特色。对于研究者来说，“民国思想流派文丛”可为其研究民国思想流派史提供一份基本资料，为其研究派中人物提供一个基本语境；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执一卷在手则知一派，可作为进入丰富多彩的民国思想世界的原始读本，以此为起点，集腋成裘，就能进而了解民国思想史的整体面貌。

由于民国思想流派众多，一时难以穷尽，所以这套文丛首先选取当时在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无政府主义派、新文化派、学衡派、古史辨派、国家主义派、乡村建设派、现代评论派、新月人权派、战国策派的基本文献编入，其他流派只能俟诸他日。在编排结构上，每派一集（现代评论派与新月人权派的思想主张和存在时间都相近，故合为一集），每集内部以人物为单位编辑文献，挑选该人最能代表该派思想的论说编入，每篇文献后注明出处。各集编排顺序如下：编辑说明、流派介绍、文献汇编、参考文献。其中数万字的“流派介

绍”，主要是简要介绍该集所涉流派的基本情况、人物生平、思想主张、时代影响等，以使读者对该派思想有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由于各派情况有异，故在写法上各集可能略有不同；“参考文献”则在提供该派文献之出处的同时，列出可扩展阅读的论著目录，以方便意欲进一步探索的读者。

选编这样一套经典性的近现代思想文献，不论对谁都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深知力有不逮，舛错失误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赐教，以利将来修订完善！

此外，本丛书中收录的某些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与作者家属或后人取得联系，望有了解此类情况者及时与编者联系，在此谨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李 帆

2012年1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古史辨派评介 / 1

顾颉刚 / 19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 19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 24

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 / 50

宋王偃的绍述先德 / 52

《古史辨》自序 / 54

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 / 66

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 / 68

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 / 70

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 / 74

瞎子断扁的一例——静女 / 80

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序目 / 85

九州之戎与戎禹 / 91

鲧禹的传说 / 106

胡 适 / 143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 143

钱玄同 / 148

答顾颉刚先生书 / 148

钱 穆 / 158

再论老子成书年代 / 158

《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自序 / 173

吕思勉 / 188

盘古考 / 188

 罗根泽 / 192

慎懋赏本《慎子》辨伪 / 192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 / 200

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 / 241

 童书业 / 250

“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 / 250

 张西堂 / 269

《左氏春秋考证》序 / 269

《荀子·劝学篇》冤词 / 289

 杨 宽 / 300

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 300

 游国恩 / 306

荀卿考 / 306

 孙次舟 / 313

再评《古史辨》第四册 / 313

 栾调甫 / 328

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 / 328

 王伯祥 / 335

《鸡鸣》 / 335

 周予同 / 337

经今古文学 / 337

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 / 347

 刘 节 / 355

评《刘向歆父子年谱》 / 355

参考文献 / 358

古史辨派评介

一、《古史辨》与古史辨学派

古史辨派，又称古史辩派、疑古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点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及古史辨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因素。传统史学观点一向认为上古时期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从尧、舜、禹经过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至周公、孔子、孟子是一脉相承的道统所系，承载道统的典籍，只能信奉，不能怀疑。近代以降，伴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产生了对中国传统的怀疑、反对乃至颠覆，其中体现的黄金上古观念随之破灭，中国古代信史需要重估，古史辨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中应运而生。就学术渊源而言，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疑古辨伪思想，也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学术土壤，远自郑樵，近至清代的姚际恒、崔述，其疑古精神及辨伪方法，都成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加以发挥运用的学术理念及学术方法。晚清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与阐发，也带给顾颉刚以启发和借鉴。此外，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倡导的“新史学”，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以及西方输入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都为我国史学研究的现代化注入了推动力。中国历史研究的众多问题，均要从古史研究中获取答案。由是，在以上诸多合力的作用下，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及古史辨派的出现，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古史辨派的形成、发展都与《古史辨》的汇编成册、出版发行密不可分。《古史辨》一至七册均由朴社首次出版发行。朴社成立于 1923 年，彼时顾颉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责任编辑，月薪 100 元（大洋）。那时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他又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在闸北租了一所大屋，一半自己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聚会场所，或开会，或阅读，或听留声机。顾颉刚在上海工作时，晚上也常去那里聚会，和大家讨论一些古史与歌谣问题。后经郑振铎提议，说我们为馆里工作，一月才拿百元左右，可是一出书，馆里可以赚几十万元，何苦来！还不如自己筹资办一个书社。大家都同意。后来，讨论

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提出10元储存在银行生息，集款到一定数目时，便可出书了。当时约集10人，有顾颉刚、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沈雁冰（茅盾）、胡愈之、谢文逸、陈达夫、常燕生等，并由顾颉刚任会计（大家公认顾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周予同为此社取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醉心于清代的“朴学”。顾颉刚对朴社用心用力最多，还亲自撰写了朴社宣言及社约。后因发生五卅惨案，朴社迁至北京。1926年，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出版后销路大好，一年内即再版20次，这样就奠定了朴社的经济基础。此后《古史辨》陆续出版，直至1941年第七册均由朴社出版发行。当然《古史辨》第一册的热销，乃在于其内容所具备的话题性和可讨论性。

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起，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古史辨学派的逐渐形成。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文发表后，引起史学界众多学者就相关问题持久的考辨争论，赞成顾之主张者有钱玄同、胡适、魏建功、容庚、罗根泽、童书业、杨宽等人，反对者包括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张荫麟等人，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人也参与了讨论，并发表意见。以此为标志引发了中国近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后来这些学者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争论考辨文章，从1926年到1941年的15年间，被陆续编辑成书，编成《古史辨》论丛七大册，其中一、二、三、五册为顾颉刚编著，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著，七册上中下三编由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共出版七册，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共三百二十五万余字。《古史辨》之“辨”与“辩”通用，故《古史辨》之“辨”兼有“辨伪”“辩论”之意，“辨伪”指顾颉刚为代表的“辨伪书”“辨伪史”“辨伪事”等研究，“辩论”则指围绕古史辨伪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的文章，其中不乏反对质疑的观点，因此《古史辨》收录的文章，并非都是赞同认可顾颉刚古史辨伪观点的。因《古史辨》而得名的古史辨派，也并无明显的学派门户特点。以顾颉刚为核心，与之学术关系较为密切或学术观点相类似的学者，在古史辨伪的研究过程中，在与其他人的学术争论中，不断地调整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立场，甚至会有前后截然相反的学术发展变化。顾颉刚本人在晚年也并不认同存在一个以“疑古”为目的的学派。

由《古史辨》七大册内容所反映出的古史辨派的相关学说，涉及广泛的学术问题，包括古史重建、古籍辨伪、经史关系、古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是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刘掞藜等讨论古史的函件和文章，以“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兼及历代的辨伪运动。书前有顾颉刚自述学术历程的六万字长序，将其如何步入古史辨伪的成长经历、学术观点由隐而显、研究思路由海而明的过程一一道来，并自认此文是其一生写的最长最畅快的文章之一。应该说由顾颉刚提出的中国古史研究的新观点和新方法，能够引发持久广泛的热论，是经过了顾颉刚长期的思

想酝酿和深思熟虑的，同时也证明古史辨时期的顾颉刚正处在学术生命的旺盛时期。因为有了第一册的热销，第二册的编著也就顺理成章了，1930年由顾颉刚编著的承继第一册研究的《古史辨》第二册出版。该书的上编讨论古史问题，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的问题，下编是人们对第一册的评论。顾颉刚自认这一册编得不好，因为没有有一个中心问题供大家讨论，于是由其编著的《古史辨》第三册，收录了专门研究《易经》和《诗经》的文章。《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由罗根泽主编，收录的主要是研究诸子学的文章。《古史辨》第五册仍由顾颉刚编著，上编文章主要研究汉代经学上的今古文问题，下编主要讨论阴阳五行说起源问题及其与古代帝王系统的关系问题。1941年童书业与吕思勉编著的《古史辨》第七册出版，上编是古史传说通论，中编是三皇五帝考，下编是唐、虞、夏史考。

以《古史辨》七大册的集结为标志，古史辨运动兴起活跃于20世纪的20年代后半期，两三年之后便进入常态研究，至40年代，随着《古史辨》第七册的结集出版，古史辨运动遂告一段落。与之相应而生的古史辨学派，以其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新论断、新方法，不仅在当时中国学术界造成轰动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规约了此后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走向。1923年，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当时学术界引发极大反响。钱玄同赞其“精当绝伦”，胡适谓其“已替中国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就连在其后与之交恶，并在学术研究上与之相对立的傅斯年也对顾颉刚的这一论断始终首肯。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在一年之内再版20次，足见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顾颉刚也借此成为享誉中外的古史专家。《古史辨》出版以后，胡适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①冯友兰在《古史辨》第六册序言中，将当时中国史学研究分为“疑古、释古、信古”三种趋势，在将古史辨派归为“疑古”的同时，也将其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价值归纳为对史料的审查，并将“疑古”的史料审查视作“释古”的必要前提。尽管顾颉刚本人对于“疑古”之说并不认同，在其晚年有关《古史辨》编订的自述中，顾颉刚认为其疑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信古的标准，所以古史辨派不完全是疑古的。当然这个解释发生在古史辨运动之后的四十年，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顾颉刚此后治学旨趣发生改变的影响，但冯友兰给古史辨派贴上“疑古”的标签，无疑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观感。

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做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极大推进了

^①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学术研究。多年来，许多研究《诗经》、《尚书》，研究古代礼制、民族、历史地理和古代神话、传说等问题的论文，都每每引用顾氏等人的论著，即因为这些论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古史辨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对将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以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讲起，启发了人们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古史辨派不仅在史学认识方面，带给人们有关中国古史的新认识，同时其结合秦汉典籍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质疑，也带给人们思想上的解放。此外，顾颉刚的古史辨伪方法，也为将中国史学理论纳入现代社会科学范畴，提供了路径。同时顾颉刚在史学研究中的“求真”精神，与其他学人展开讨论所秉持的平等的学术态度，都成为宝贵的学术财富。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学术上的局限和武断片面的东西。但不容置疑的是，古史辨派为当时中国的古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同时也为继起的史学派别，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学术基础。

二、与古史辨派相关的学人

1. 顾颉刚

古史辨运动的蔚然兴起以及古史辨派的形成出现，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作为运动的发起开创者及学派的核心人物顾颉刚，其个人的成长经历及学术发展道路，既承载了时代发展的因缘际会，也成就了古史辨运动和古史辨派。

顾颉刚一生涉猎的学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著述丰厚，但无论是其边疆历史地理研究，还是民俗学研究，某种程度上都服务于他的古史辨伪研究。纵观其一生学术生涯，20世纪20至30年代初期，是其学术生命力最为旺盛时期，也是其古史研究影响最为广泛热烈时期。也正是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研究，奠定了其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古史研究专家的学术地位。

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学术观点的形成及《古史辨》的汇编成书，均与其早年置身的学术环境，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影响以及其个人思想历程的发展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对此，顾颉刚在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以及晚年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文中，都有所论述。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他说：“要是我不生在科

举未废的时候，我的幼年就不会读经书。要是我的祖父不给我随处讲故事，也许我的历史兴味不会这样的深厚。要是我不进新式学校，我也未必会承受这一点浅近的科学观念。要是我在幼年没有书籍的嗜好，苏州又没有许多书铺供我闲游，我也不会对于古今的学术知道一点大概，储藏许多考证的材料。要是我到北京后不看两年戏，我也不会对于民间的传说得到一个大概的领略。要是我不爱好文学、哲学和政治运动，在这种方面碰到多少次的失败，我也不会认识自己的才性，把我的精力集中于考证的学问上。要是不遇见子水和太炎先生，我就是好学，也不会发生自觉的治学的意志。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要是北京大学中不征集歌谣，我也不会因写录歌谣而连带得到许多的风俗材料而加以注意。要是我没有亲见太炎先生对于今文家的痛恨，激动我寻求今文学著述的好奇心，我也不会搜读《孔子改制考》，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要是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没有刘楚贤先生等把我痛驳，我也不会定了周密的计划而预备作毕生的研究。要是我不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服务，没有《歌谣周刊》等刊物替我作征求的机关，我要接近民众的材料也不会这样的容易。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辩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① 再从顾颉刚本人的特性来看，也与他的学术主张有着密不可分关联。顾颉刚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又是一个历史兴味极浓重的人，欢喜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来踪和去迹。同时又是一个好奇心极发达的人，会随时随处发现问题，在得不到解答的时候就会觉得烦闷的不可耐。因为有了这几项基本的性质，顾颉刚才“敢于怀疑古书古史而把它作深入的研究，敢于推倒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②

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实质性工作，早在1920年便已开始。只不过当初着手此项工作的时候，无论是顾颉刚本人还是带给他深刻影响与启发的胡适和钱玄同，在当时都未曾想到，他们由此开始的是一项蔚然成风并引发诸多讨论的学术运动。胡适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当年，即1926年，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一文中曾提到：“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四

① 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② 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第79页。

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然而这样‘一本万利’的收获，也只有顾先生这样勤苦的农夫做得到。”^①那么，胡适写给顾颉刚的究竟是一封什么内容的短信呢？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开篇，收录了该信内容：“颉刚：你的《清籍考》内没有姚际恒。此人是一个狠大胆的人。我想寻求他的《九经通论》，不知此书有何版本？你若知道，请你告我。”^②其时顾颉刚任北大图书馆编目员，“是年，作《伪书疑书目》及《中国目录书目》，集得许多材料。”^③并将自己所撰《清代著述考》稿本，送给胡适，供其参考，胡适看后很欣赏，“认为先生抓住了这三百年的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④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交往中，胡适写信给顾颉刚，请其代为查找姚际恒的《九经通论》。顾颉刚随即复信做相关介绍，后胡适又叮嘱其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胡适交代这一任务，一来是因为知道这是顾颉刚的学术兴趣所在，二来是想借此让经济上并不宽裕的顾颉刚得到一点报酬。不想原本几天就可结束的标点工作，在凡事都要问个究竟的顾颉刚做来，却引发了许多问题：“有的是查不到，有的是虽是查到了，然而根上还有根，不容易追出一个究竟来。到了这时候，一本薄极的书就牵引到无数书上，不但我自己的书不够用，连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用了，我就天天上京师图书馆去。做了一二个月，注解依然没有做成，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的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帐[账]。我不愿意单单注释《伪书考》了，我发起编辑《辨伪丛刊》。”^⑤随即，顾颉刚由辨伪书发展到辨伪史，并开始有了推翻古史的确切意识和清楚计划：“第一，要一件一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起来的，又是怎样地变迁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这人怎样说，那人又怎样说，把他们的话条列出来，比较看着，同审官司一样，使得他们的谎话无可逃遁。第三，造伪的人虽彼此说得不同，但终有他们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戏中的故事虽各各不同，但戏的规律却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寻出他们的造伪的义例来。”^⑥

①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第335页。

② 胡适：《询姚际恒著述书》，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第1页。

③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④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57页。

⑤ 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第42页。

⑥ 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第43页。

此后，考辨古史成为顾颉刚学术研究的明确目标。而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要论断，在其1922年为商务印书馆编撰《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便已通过《诗》、《书》、《论语》中有关上古传说的比较中，初步酝酿成型。这一学术论断述诸文字、公开发表并引发众多学人参与的古史论战，则是通过1923年5月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九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原本局限在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三人之间的有关古史研究的学术书信往还，扩展为有魏建功、容庚、罗根泽、童书业、杨宽、刘澹葵、胡堇人、柳诒徵、张荫麟、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众多学人参与的古史论战。一时之间，反对者有之、赞同者有之、问难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抨击者有之、劝告者有之，古史辨运动由是而兴，古史辨派也在《古史辨》七大册的学术书信、文章的集结中，渐次形成。1926年至1934年近十年时间里，顾颉刚先后编撰了《古史辨》第一、二、三、五册。他在这一过程中，发表了大量有关古史辨伪的文章，表述其有关古史研究的新论断、新方法，并成为众多学人讨论的焦点。至此，顾颉刚当之无愧地成为古史辨运动的发起者与古史辨派的创建者。顾颉刚编撰《古史辨》期间有关古史辨伪的创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禹”的演进史的考辨。反对顾颉刚的学者常常引用“禹是一条虫”这一似是而非的论断来批驳其古史观点。其实，顾颉刚是最早对“禹”进行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综合考察的学者。顾颉刚“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有了传统的观念，于是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①

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念。顾颉刚在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阐述了他的这个古史观。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式地造成的”。他把这个基本的古史观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演化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及至战国时代又出现了黄帝、神

①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第63页。